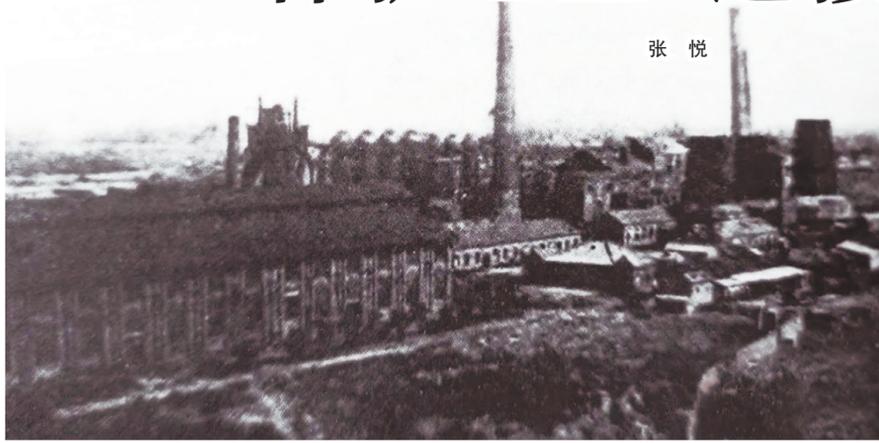


纪念太原解放75周年

保护工业 迎接解放

张悦



新中国成立前的西北炼钢厂

始建于1934年的西北炼钢厂是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也是我国最早的不锈钢生产厂。在太原解放战役前后,这座钢铁厂的职工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奋力保护工厂的机器设备,阻止敌人破坏性生产和敌特破坏活动,最终确保这一企业顺利地接管接收,并很快实现了复产。1949年7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指出,1949年4月由太原军管会接管的西北炼钢厂迅速完成恢复生产的工作,钢锭、生铁产量甚至超出原定计划。在“一五”期间,该厂是我国特殊的特殊钢生产基地。1952年9月中旬,该厂电炉炼钢部在3号电炉上成功试炼了新中国第一炉不锈钢。

保护机器设备 坚持抵抗斗争

1948年6月到7月,解放军在徐向前指挥下取得了晋中战役的胜利,并对太原孤城守军实施战略包围。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指出:“太原有速下之可能,华北局应即完成接收太原的一切准备工作,不要太原已下,无人接管。”华北局旋即成立太原军管会负责战后接管事宜,至此太原解放和接管也进入了倒计时。

太原是一座工业城市,军管会将工业接管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为保护太原城内的工业企业,解放军攻城部队发布了一系列布告,号召原企业职工保护工厂机器设备、资料档案等物资。例如,1949年2月发动新一轮总攻前,徐向前、周士第、胡耀邦联合签署布告,其第六条指出:“凡蒋匪、阎匪等公营工厂、货栈、仓库等职员,应安心照常营业,保护机器、设备、资料、账册、文件、档案,听候民主政府处理,不得怠慢破坏,民主政府对上述人员准予录用。”与此同时,太原军管会通过城工部联系隐藏在太原城内各处的地下组织,号召他们联系进步工人和各界群众保护太原城内主要工厂。

鉴于西北炼钢厂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早在企业建立之初,便在厂内开展地下活动,为护厂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1947年后,阎锡山集团为了坚守太原以作困兽之斗,将西北炼钢厂绑上战车,以钢铁产能制造电网线、手榴弹外壳、重机枪枪身、炮弹尾翅和修建碉堡所用的钢筋,漠视工人安全和设备承受能力,进行破坏性生产。地下党组织在认清敌人目的后,随即组织进步工人通过消极怠工、罢工等方式应对,一方面保护设备不被破坏,另一方面也破坏了敌人的军工生产,客观上支持了太原解放战役。例如,炼钢课进步工人王贵英在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与敌人周旋,坚持团结工友,拒绝敌人的破坏性生产任务。据工人回忆,当时的炼钢平炉由于长期破坏性生产而超负荷运转,时常发生事故。可是,敌人为了军工生产却继续超负荷使用,与此同时,当时被解放军包围的太原粮食供应紧张,敌人不断克扣炼钢厂工人工资。为此王贵英顺应工人们的要求,带领大家举行罢工运动,掀起了炼钢课工人运动的高潮。其他部门工人们也纷纷响应,炼钢厂工人运动此起彼伏。

1949年2月,随着太原解放战役的推进,敌人意识到败局已定,妄图破坏炼钢厂的重要机器设备。进步工人们为了保护工厂,与敌人不断周旋。当时

国民党反动派控制下的三青团、同志会等反动组织和阎锡山集团的特务组织都曾参与破坏活动,恶霸、小偷和反动会道门组织也趁机兴风作浪。鉴于此,地下党组织号召进步工人积极联系职工群众,保护炼铁课、炼焦课、炼钢课、轧钢课、线材课等部门的设备、账册和文件等重要资料。例如,炼钢厂炼焦课的焦炉为德国造设备,非常珍贵,因此该部门大多数职工在地下工作者与进步工人带领下日夜巡逻守护,方保设备无忧。

组织护厂活动 迎接太原解放

1949年4月15日,解放军20兵团一部由太原北郊出发,向城垣方向推进,至4月21日傍晚,兵锋已直指太原城垣下的大北门、小北门阵地。据指挥战斗的杨成武将军回忆,为了减少对太原城北工厂及居民区的破坏,并防止敌人依托厂区及街巷抵抗,杨成武将军放弃了平行推进的作战方式,制定了“分割包围,就地歼灭”的策略。如此不但有利于解放太原,而且在客观上保护了包括西北炼钢厂在内的城北工厂区。与此同时,负责接管西北炼钢厂的接管小组也在第一时间从驻地榆次出发,经东山、黄寨等地昼夜兼程抵达太原北郊。

此时的西北炼钢厂内已经可以听到隆隆炮声,可大多数工人和部分工程师、职员坚守在岗位,进步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防止敌特破坏。据档案显示,4月20日前后,西北炼钢厂炼钢课平炉、线材课办公室和动力课发电车间等处遭到小规模溃军的袭击,厂部、工程师室和几个仓库也出现敌特破坏。在动力课附近,解放军一支小队与阎军交战,守城阎军依托城墙炮击,破坏了动力课的电线和蓄水池。情况危急之下,留守职工仍然坚持采取多种方式保护炼钢厂。例如,某日夜间,一伙“一贯道”徒众想要抢劫工程师室的财物,遭到一位爱国工程师的喝止,进步工人们也赶来支持;为防止敌军空袭和炮击引发火灾和爆炸,炼焦课和轧钢课进步工人们及时将车间内易燃材料搬离。

据时任西北炼钢厂副厂长的进步工程师梁海桥回忆,4月19日上午,他由太原城返回炼钢厂时,附近已是炮火连天。为保护机器设备,梁海桥采取了一些技术性临时措施。由于日伪的破坏性生产和解放战争时期故障频发,厂里的机器设备一直存在很多问题。而钢铁生产具有特殊性,炼铁炉、炼焦炉等设备炉温降低容易造成裂炉、炸炉等生产事故。因此,在厂区解放前后,梁海桥让工人和技术人员用矿粉将炼铁蒙了起来,给炼焦炉里填了些煤保持炉温,防止了裂炉事故的发生。接管组进入厂后,又带来了部分原料及时补充,从而确保了机器设备的安全。

发动进步工人 防止敌特破坏

据工人傅维忠回忆,4月19日夜间,他在新城车站附近遇到解放军,随即将他们带进厂区。此后,解放军在进步工人配合下,解除了敌人“护厂队”的武装,也阻止了敌人的破坏行动。与此同时,西北炼钢厂接管组进入炼钢厂接管,并于4月20日召集职工代表会议宣布接管。

炼钢厂接管之初,由于太原城尚未完全解放,阎

军据守城垣困兽犹斗,甚至以城墙为依托对炼钢厂实施炮击。在4月22日的一次炮击中,动力课的水塔被炮弹击中,全厂被迫停电48小时。国民党军队的战时也时常飞临炼钢厂上空,进行轰炸和扫射,妄图破坏工业设备,并造成人心混乱。为此,接管组一方面部署职工组织防空工作,保护精密仪器和重要设备,并确保人员安全;另一方面也号召职工们积极抢修机器设备,抢通水电供应,并为恢复生产工作打好基础。潜伏厂内的敌特势力和破坏分子也蠢蠢欲动,经常发动破坏活动,长期威胁工厂的安全和稳定。他们采用涂写反动标语、给先进职工投寄恐吓信和破坏生产设备等方式多方搞破坏。为此,炼钢厂接管组在解放军配合下加强警戒,在厂门、重要车间及仓库等处设置岗哨,同时发挥进步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组织工人护厂队进行巡逻。

据一位炼钢部工人回忆,他曾经主动申请在下班后参加工人护厂队组织的站岗和巡逻,保卫机器设备和仓库免遭破坏。某次,他和工友们抓获了一名妄图偷窃设备零件的坏分子,并将其扭送至公安机关。上级部门因这次立功表现,将他发展为青年团员。

与此同时,接管组发动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对全厂工业设备进行摸牌检修,查清战乱和长期掠夺式生产对各类机器设备造成的破坏。

1949年9月,敌特势力破坏了炼钢厂连接新城的电线线路,造成电器设备损毁严重。甚至到1950年仍时有破坏活动发生。据当时的保卫干部齐景秀回忆:“1950年春节的一天夜晚,我警卫大队一中队警卫班长阎士恩同志在给厕所执勤巡逻时左手被打断。还有反动分子将焦化厂煤气管道用破麻袋堵塞,企图制造爆炸事故。此后不久,还有一伙旧势力在下班时挑拨闹事,殴打我在古城门站岗的解放军战士。”为此,军管会和后来成立的厂党委高度重视安全工作,一方面强化保卫部门力量,并组织工人护厂队加强全厂保卫工作;另一方面,也加强群众工作和职工思想教育,配合上级的镇反运动,孤立和打击反动分子。在此期间,全厂工人积极参加有关工作,许多年轻工人主动参加护厂队,保卫全厂安全,炼钢厂还组织了各类群众性政治运动,坚决打击残余敌特势力和各种破坏分子。当时年轻职工参加护厂队和打击坏分子的热情十分高涨,1949年下半年曾挫败多起破坏活动,打击了敌特势力的嚣张气焰。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西北炼钢厂的工人集会



国民党军队据以防守西北炼钢厂附近的“梅花门”(位于今太钢博物馆内)

3月28日本版文章《八大碗(香八方)》刊发后,受到我市民俗学者和热心读者的关注,也引发了“八大碗来源与沿革”“过油肉算不算八大碗菜系”等诸多热议。这样的讨论,对于挖掘太原历史文化、推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有裨益。本报选取其中部分观点,与读者共绘。

——编者

八碟八碗礼考

王清著

八碟八碗在山西传统菜系中占据重要一席。

从礼仪和规范角度讲,“八碟八碗”摒弃了著名的平遥牛肉。明清之际,尽管严禁屠宰耕牛的禁令已经名存实亡,但“耕读传家”的晋商仍然会严格执行,除在祭祀等重要节庆会牺牲以外,一般对牛采取保护措施。

碟碗通用,符合山西文化饮食氛围需求。清代以前,山西餐桌以八仙桌为主。受桌面所限,将碟改为碗,有效缓解了桌面的拥挤。同满族八碟八碗的海碗特征相比,晋系八碟八碗较小,且越是富户碗越小。一方面是实力体现,另一方面是规矩使然,节俭之道直接体现在餐桌礼仪上。

八碟八碗的菜式不过是后来民间的演化,大户人家菜品数量远远不止八碟八碗,而是按照礼仪严格以四的倍数递增,著名的有“一百单八席”“八十八件海碗席”“六十四味席”“四四到底席”。八碟八碗的说法也由此而来,其本意是菜品的规矩和基本流程,有着鲜明的官府菜和饮食文化的含义。

在山西一些地区,婚嫁中至今还保留着“嚎菜”习俗:入席的亲朋友共同选取一道压桌凉菜风卷残云,始终保持着上桌即尽的状态,直到主人这道菜的备菜全部上空。有经验的主事会在上一道菜即将光盘之际迅速送上一道菜品。这个时候,或是歌声,或是嘹亮的口哨,便会从大院中快乐传出,用独特方式表达对主人的祝贺。

在山西,无论普通人家还是大户人家,入席之前都要有压桌的干果时鲜,花生、瓜子、青梅、杏脯,包括糖果等,这也是过年或者婚嫁上准备瓜子、花生、糖果的由来。除果品外,桌子上还有四荤四素八个压桌凉菜,即所谓的“八碟”。不同于日常聚餐,四荤四素的食材选取也相当考究,素菜类不仅有海参、海米、海蜇等作料,还要有山珍菌类的存在。即便小户人家,也要将平日节俭下来的木耳、银耳、金针菜摆上餐桌。荤菜大多数选取各地名字号的熟肉,如太原六味斋、祁县吉兴园、太谷盛隆长等商号,甚至远赴河南、北京等地采买。

与一般人的印象不同,八碗的上菜顺序并非是碟碗分离,而是按照一碗配四菜的要求同步上席,荤素搭配,颜色分明。四菜又分四炒、四烩、四汤、四点心,逐一而上。仅上一道碗菜和四道辅菜,也相当于平时一顿丰盛的家宴。

八碟八碗是这些美食的总称,碗为主菜,碟为配菜。以八为名,无论八仙桌还是八碟八碗,均有着四平八稳的美好寓意。

按照礼仪,八碟八碗菜品的数量也不是一成不变,主家会根据宴会规格、接待对象等增减变化。比如民间约定俗成,“寿席食九,婚宴食八,丧饭食七”。又如在宴请外宾人士时会增加肘子、火锅等菜品,而对江南客人则以虾仁、樱桃肉等待之,彰显了晋商待客礼仪。如果是待客,客人尊卑等级又决定了菜品的多寡和食材的种类。慈禧西逃山西,太谷曹家和祁县乔家直接上了“一百单八席”,整个宴席上菜十九次,山珍海味、飞禽走兽应有尽有,极尽人间享受。

后来,“八碟八碗”流传民间,并根据百姓所能达到的生活水平,慢慢演变为具体的食谱食材。“八碟八碗”被食材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望文生义,受满族八碟八碗影响,满族八碟为四冷四热,八碗涵盖麻辣酸甜等味道,菜名便是食材,因此山西民间直接将“八碟八碗”作为菜谱,甚至成为工艺做法。

八大碗与过油肉

李拉弟

八大碗是太原传统饮食文化中的一种传统宴席格式,通常包含八种主要的大菜,它不仅仅是指席上菜品的数量,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

“八”字在方言中可能与不吉利的词汇谐音,因此在某些地区可能会选择摆九个碗或十大碗以避讳。如太原旧城晋源为代表的筵席菜,就是十大碗。20世纪30年代,林香斋的十大碗很有名气,这十大碗分别是:米粉肉、红烧肉、小酥肉、酱梅肉(腐乳肉或腐乳肘子)、黄焖鸡块、江米甜肉、红烧鱼虾、八宝饭、红烧牛肉、坛子肉扣碗菜。以林香斋为代表的市肆菜基本上全是肉菜。而以小店八大碗为代表的民间菜则有所改变,为六荤二素,有方烧、蒸丸子、酱梅肉、蒸肘子、小酥肉、八宝饭、海带肉、虾米白菜。

由于婚丧嫁娶、社会团体活动、民俗民俗等聚集性餐饮的场面大,就餐人数多,桌椅、碗筷等数量不够,只好采取“随来随吃,吃完即走”的流水席方式。席面按辈分、名望、亲疏来决定入席次序,虽有先后之分,但菜式一致,按自己条件,量力而行。因大肉等食材多是平日难得之物,流水席又要求做得快,供得上、分量足、味道稳定,于是就选择

以粳(bie)、蒸、煮为主,用粗瓷大碗盛放,以示量足。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太原八大碗的菜单基本固定。

传统的八大碗里并没有炒菜。这既是由八大碗的地域特色和传承形式所决定,也是太原非物质文化遗产风味饭菜的独特魅力所在。因此,不能把太原筵席上的过油肉与太原八大碗混为一谈。

太原过油肉因选料讲究,注重火候,风味调和,其葱、醋、椒合理调配成的独特风味,成为区别其他地方、菜系类似菜的特色,是一道烹饪功夫菜,也是太原、乃至山西风味饭菜中最具代表性的看家菜。

过油肉在太原筵席中,存在于比八碟八碗高一规格格的“三八席”(俗称:八碟八碗八碗)中。上世纪,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后,食材丰富了,烹饪技术也有很大变化,人民追求新的饮食方式,又出现了筵席“八六四”规格,这种筵席中也有过油肉。这种规格的筵席中,八碟格式不变,八碗出现了变化,精选四碗垫底,中间的“六”是大菜和炒菜,一般是红烧鸡、红烧鱼、过油肉、炒豆腐(或烧蘑菇)、糖熘山药、炒灌肠;四碗是条烧、方烧、喇嘛肉(或四喜丸子,或清蒸丸子)、馒头(也称海米白菜、虾米白)。

武后文水省亲有佐证

王学礼

初唐显庆五年(660)的春天,36岁的武则天曾与唐高宗一起驾幸并州,并借此回到故里文水省亲祭祖。《旧唐书》卷四《高宗上》载:“五年春正月甲子,幸并州。二月辛巳,至并州。”只言武则天驾幸并州,对于其间是否回文水只字未提。因而史学界对武则天文水省亲一事,长期以来一直存有疑问。

在此,笔者提供两个武则天当年回文水省亲祭祖的佐证,与史学研究者商榷。

武则天是文水县大陵乡徐村人。唐初的徐村村址,在明代以后改称为“北徐村”。《永乐大典》卷4第56页“官室”一栏,记载有“官室:溪亭,在北徐村寿宁寺内”。《永乐大典》卷5203“寺观”记载:“寿宁寺,本武氏白家庄。”说明当年有人在北徐村武家庄园内,建有名为“溪亭”的皇家行宫。这处官室,《永乐大典》并没有说明是哪位皇帝、嫔妃的行宫。在明代天启五年(1625)《文水县志》“艺文志”卷中,我查到了北宋年间书法家张商英写的《溪亭二首》,以及宋代提学副使石介在“溪亭”壁间题写的诗作。说明至少在北宋时期,“溪亭”成为了文人墨客游览的名胜景观。古代皇权神圣,能在武则天的家乡北徐村营建官室,除了武则天当年回乡享用,谁能有这样的资格?历史文水之古往,唯有因唐显庆五年(660)唐高宗、武则天驾幸并州,回到文水前所营造。这是对史书上没有武则天回乡记载的一个补证。

还有另外一个佐证。21世纪初,文水县马村西梁出土的一方首题《唐故处士孙君(嗣宗)墓铭并序》的墓志铭,志主是唐代一位名为孙嗣宗的处士。古代墓志铭的撰写,一般都会记叙死者的姓名、字号、籍贯、官级、功德事迹,特别要写去世的时间、下葬的日期。但是孙嗣宗的墓志铭,在志文近结尾处只写了“皇唐驾幸之明年,宅居于晋右矣”,没有记述下葬“宅居”的具体时间,只说孙嗣宗的下葬时间在唐代皇帝驾幸的第二年。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就葬在北徐村不远处“因山为坟”的山脚下。这次并州巡幸,除了回乡祭祖之外,以女儿身份回乡省亲的武则天以及唐高宗随行队伍浩浩荡荡,回乡营造了行宫“溪亭”,还宴请了武氏亲族、故旧、邻人,“诸妇女年八十以上,各版授郡君”。这在当时的文水来说,必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事件。可以说,“显庆五年”是文水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非常特别的标志年份。对于孙嗣宗志文撰写人来说,可能认为“唐代皇帝驾幸的第二年”的含义,对于后人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孙嗣宗下葬具体时间“显庆六年”就无需在志文中赘言了。这样“以事代年”的写法,在古文中经常使用。

在武则天的故里文水北徐村,只有皇帝才配享用的行宫“溪亭”,有唐代文水曾“皇唐驾幸”的石刻记载,我想,武则天在660年曾回乡省亲祭祖的史实,应该可以确定。



《唐故处士孙君(嗣宗)墓铭并序》